

关注启动内需的非经济性因素

Close Attention to the Non-economic Factors in Promoting the Domestic Demands

贾大明

(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与技术开发中心, 副研究员 北京 100810)

截止 1999 年 6 月, 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已持续 21 个月, 消费价格指数下降持续 17 个月, 生产资料价格下降持续 39 个月。近年来, 国家为启动内需, 扩大消费采取了增加基建投入、增加货币供应、连续降息、增发国债、税收减免等一系列措施, 但成效甚微。国内外专家各抒己见, 从货币政策、收入分配、生产供给、金融体制与国企改革, 到启动住房、汽车消费, 鼓励居民旅游, 实行消费信贷, 开拓农村市场等提出种种有价值的思路与对策。各有关部门也据此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但迄今为止, 通货紧缩的现象尚无改观, 内需启动也无明显的迹象。尽管不少人著文启发老百姓要改变消费观念, 敢于借钱买房、买车、买家电, 再三劝导, 要舍得花钱, 但言者谆谆, 闻者藐藐, 银行个人存款继续剧升,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消费价格指数、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持续下降, 老百姓似乎把钱袋子捂得更紧了。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笔者以为, 真正启动内需, 仅靠行政的、经济的措施是远远不够的; 还要关注启动内需的非经济性因素的研究, 采取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确实能惠及老百姓并能获得老百姓理解、支持的改革方式与措施, 内需才能真正启动, 国家的宏观改革也才能获得良好的预期。

当前要关注的影响启动内需的非经济性因素问题主要有 6 个方面。

一是把中国的经济改革简单化, 吊高了老百姓的胃口, 却又在某些方面过多地损害了老百姓的既得利益。

我国转轨期间的经济改革是在人口众多、经济欠发达、人均资源较少、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的状况下启动的。中国的国情注定这场经济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 甚至可能出现反复或某项改革的预期不佳。大概是出于号召大家支持改革、参与改革, 相当时间以来过多过高地宣传了改革给老百姓将带来的可见实惠, 以致人为地吊高了公众的胃口。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各种复杂的问题诸如通货膨胀、下岗分流、分配不公、腐败行为、社会治安

等接踵而来时, 老百姓心理上就缺乏准备, 也难以接受。特别是对某些过多损害既得利益而后期又未予以有效补偿的改革措施, 老百姓产生某种抵触与不满心理, 是很正常的。

二是启动内需的指导思想老百姓难以接受。

为了启动内需, 有关部门总是动员老百姓把五六万亿存款拿出来花掉, 以帮助解决国企因重复建设而库存的大量质次价高产成品的积压问题, 以及由此而来的资金周转不灵、职工大量下岗问题; 又想依靠开拓农村市场, 让农村人口把城市多余商品买去, 让农民来帮助国企的结构调整和产品升级。这客观上是把国企解困、职工下岗的改革成本向农民转移。其实这种指导思想和想法过于天真, 首先居民和农民手中余钱有限, 其次老百姓也不会那么“没算计”。诚如戴园晨先生所讲的那样: “毕竟钱是居民自己辛苦挣来的, 不像‘不当得利者’花着不心痛……因为生活在不断教育人们如何进行选择, 而捂紧钱袋毕竟是留给居民的选择自由”。

三是过高估计了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改革 20 年来, 中国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这是人所共见的事实。但按照联合国制定的国际公认的人均消费水平来看, 中国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还是相当低的。据世界银行《1998/99 世界发展报告》分析, 1997 年中国人均 GDP 为 860 美元, 按当年我国消费额占 GDP49.5% 的消费水平, 并按平均价购买力来计算, 我国每天消费不足 1 美元的 (联合国将此划为绝对贫困线) 有 22% 的人口, 约 2.3~3 亿人; 每天消费不足 2 美元的有 43.5% 的人口, 约 5.4 亿人。据此数据分析, 我国有近 70% 的人口仅处于维持温饱和简单再生产的消费状况。中国的多数老百姓生活改善了, 手中有了些余钱, 但他们毕竟还不富裕, 几十万元一套房、十几万元一辆车和上万元一瓶 XO 离他们还实在太遥远, 总把眼睛盯着银行里那几万亿存款是没多大意义的。因为那些存款真正落实到十几亿老百姓头上人均不到 5 000 元, 是极有限的。所以, 千万别过高地估计老百姓的真正消费能力。

四是过高估计了城镇职工心理和实际承受力。

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镇职工,以往虽然名义收入很低,但生老病死、子女就业等几乎全由企业或国家包揽,在普遍低水平下工作生活较为安定,一般无经济上的后顾之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的深入,面对下岗,即结构性失业和阶段性失业,职工开始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这种下岗或分流已从国有企业向机关、学校、事业单位扩展。加上我们舆论过分宣传“减员增效”作用,片面宣传机关分流和事业单位3年内全部断“皇粮”等等,自然会使人惶惶,对不确定的未来难以摆脱忧心和担心。尤其是当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健全的情况下,将大量职工推向社会,给职工本人造成的震动、困难、痛苦、困惑,不身临其境是很难体会的。不仅如此,其家庭成员、同事、邻里都会联带受到影响。下岗职工的生活费本已有限,且常有拖欠,他们自然要精打细算以维系生活;未下岗的职工不知明天是否也要下岗,也自然要捂紧钱袋子,“备粮备荒”,哪里敢放手消费呢?

近年来,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社会保险等改革相继出台,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毫无例外地都是指令性要求,责成老百姓在并不富裕的钱袋子中拿出“一点”又“一点”,多年来国企的困难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分流,使城镇职工的实际支出的增幅显然高于收入的增幅,说明城镇职工实际承受力也是较为有限的。笔者在国企调研时,不少老职工向我们诉说:什么改革都要我们拿一点,我们究竟有多少个“一点”啊!面对相继出台的都要职工拿出一点的改革措施,职工无可奈何,其唯一可选择的是把自己的钱袋子捂得更紧一些。

五是腐败与社会不公现象对正常消费的抑制。

尽管国家强调要严惩腐败,但由于体制上、机制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寻租、贪污、受贿甚至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在不少部门、不少地区、不少行业已相当严重,加上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社会不公现象较为突出,而这些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又长期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使老百姓心态失衡,产生被剥夺感及对改革的疑虑和不满。另一个社会现象是,在制度尚有缺陷的状况下,除权力部门容易产生腐败之外,一些垄断性行业和相对稀缺部门也借机寻租,使老百姓的灰色支出呈刚性增长态势,如就医要送红包,子女入学、入托、转学要“自愿”赞助成千

上万元。在某些地区、某些部门,老百姓是无“钱”无“礼”寸步难行。灰色的支出多了,必然会影响正常的消费。很显然,腐败与社会不公现象得不到有效扼制和治理,制度缺陷不能尽快修补与调整,不仅会加大老百姓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不敢大胆消费,也会动摇对改革的信心与支持。

六是缺乏对路商品和优质服务,难以刺激消费欲望。

刚刚告别短缺的中国消费品市场产品结构调整滞缓,缺少面向广大公众的适销对路的、升级换代的产品,加上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给消费者物质、精神上造成许多损害,这也制约了老百姓的消费欲望。尽管老百姓,特别是城镇居民对住房、汽车和各种服务有较大的需求,但囿于行业部门垄断而造成的价高质差、售后服务差以及住房二级市场启动滞缓等方面的原因,致使一方面几百万住房特困户有强烈购房需求却不买房,另一方面城镇却积压7000多万平方米商品房待售。有能力的,其住房、汽车消费已完成;无能力或能力有限的消费者,可能要等待进入WTO后,汽车、家电价格大幅降低后再消费。关于这一点,美国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在名为“日本陷阱”(Japan's Trap)一文中,用消费者跨期优化选择理论,对消费者行为的分析颇有意思。他认为:在公众的预期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同样1元钱,对消费者来说,未来“享用”这1元钱就会比当前“享用”所产出的效用更大;预期未来消费的1元钱可能等于当前消费的1.1元钱,就自然会抑制当前的消费。对多数中国消费者来说,由于对未来预期不佳而紧缩当前的消费,主要是为防备今后不时之需,尚不是追求更大的消费“享用”。

启动内需扩大消费确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诸多因素互为交叉作用的复杂课题。实践证明: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观念、方法是很难奏效的。希望有关部门多关注启动内需的非经济因素,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以使政府启动内需的愿望与老百姓增加消费的行动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政府推动,市场拉动,老百姓也相应行动的最佳格局。半个多世纪之前,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讲过的一段话可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凯恩斯说:当人们变得疑惑或恐惧时,他们就把货币,即他们的收入留在口袋里;当投资者预计投资没有足够的收益时,即使是储蓄利率低,他们也会克制自己不投资。

(责任编辑 蔡德诚)

重要更正:本刊第10期第30页“我国荒漠化防治如何走出困境”一文的作者应为宋宗水,误为宋宗忆。特此更正,并向作者本人和广大读者致歉。

——编者——